

国际投资学年度进展综述

国际投资研究室*

一、跨境直接投资

(一) 境外直接投资 (ODI)

2013年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研究围绕理论进展、决定因素分析和海外投资影响等方向不断推进。一个日益重要的研究方向是利用微观层面的数据来分析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国内、国际影响(葛顺奇、罗伟, 2013; 蒋冠宏等, 2013)。而在传统的用国别数据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及其决定因素框架下, 理论模型和制度变量得到更多的重视(罗伟和葛顺奇, 2013)。

1.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展

关于现有的主流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是否能解释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一直以来有所争议。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是否具有专有资产优势, 又称为所有权优势。葛顺奇和罗伟(2013)^①基于由《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合并而成的全新微观企业数据库, 发现母公司的竞争优势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这些竞争优势因素包括新产品占比、人均管理成本、人均产出、资本密集度、利润率和出口强度, 其中, 新产品占比和出口强度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影响大小及解释力均显著高于其他因素。同时, 作者还发现体现竞争劣势的债务利息率则阻碍了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这一发现说明母公司竞争优势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确有显著影响。生产率是体现母公司竞争优势的另一重要指标, 戴翔(2013)^②用2004—2010年我国行业层面面板数据进行的研究却发现生产率并非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决定因素。这与田巍和余森杰(2012)^③用企业层面数据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这可能与作者使用行业层面的数据有关。

* 写作分工如下: 王碧琚负责境外直接投资部分; 李国学负责外商直接投资部分; 王永中负责外汇储备管理投资部分; 潘圆圆负责主权财富基金部分; 张金杰负责跨国公司部分; 韩冰负责国际投资协定部分。作者均来自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投资研究室。

① 葛顺奇、罗伟(2013): “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母公司竞争优势”, 《管理世界》, 第6期。

② 戴翔(2013):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生产率悖论及其解释—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南开经济研究》, 第2期。

③ 田巍、余森杰(2012): “企业生产率和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企业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 《经济学》(季刊), 第2期。

然而,即使能证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相比于没有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和其他方面的企业专有资产优势,也无法完全说明传统理论对新近发展中国家海外直接投资的解释力。因为还需要比较的是中国在东道国投资的企业和其竞争对手,以及其他国家在东道国投资的企业和东道国本土企业的竞争力。

更多的学者认为无法完全利用原有理论解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近发展中国家的海外投资行为,尤其是在发达国家投资的行为。Si等(2013)^①通过分析三一集团的案例发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wnership-Location-Internalization Model)和资源连接(Linkage)、杠杆(Leverage)和学习(Learning)(即LLL框架)的中间道路,其中OLI Model有利于理解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行为,而LLL Model对于解释中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更为有力。Huang和Wang(2013)^②提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国模式。作者利用微观层面数据发现中国企业向海外进行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培育自身的竞争优势。并提出一个假设: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存在一个生命周期,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逐步从获取战略资产到提高生产效率再到占领当地市场。

2. 决定因素分析

随着2003年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首次发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2年《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颁布,用宏观国别数据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实证计量研究逐渐增多,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这一研究趋势在2013年继续推进。

其一,用流量数据进行决定因素分析。祁春凌等(2013)^③用2003—2009年中国对16个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技术寻求是我国对高技术水平的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同时,发达国家对我国技术转让和高技术产品出口的限制越多,我国对其进行的技术寻求型直接投资就越多。但是作者用中国在各国外高科技产品出口额中所占的比重来表示各国对华技术转让和高技术产品出口的限制程度这一指标值得商榷。与流量数据相比,存量数据避免了海外直接投资大幅波动带来的不稳定性。

其二,用存量数据进行决定因素分析。罗伟和葛顺奇(2013)^④用2003—2009年中国对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及其决定因素,结果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倾向于流入市场规模大、工资水平低、贸易成本高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的固定成本差异程度小的国家和地区。他们的研究相对于既有文献体现了三个方面的贡献:一是在理论上,为实证分析设定了一个理论框架,能够有效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区位分布的影响机制;二是在方法上,采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作为分析基础,是对传统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分析的一个有益补充;三是作者首次分析了关税、非关税壁

① Si Yuefang, Ingo Liefner, Tao Wang. 2013.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Middle Path between Ownership - Location - Internalization Model and Linkage - Leverage - Learning model." *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 23 (5) .

② Huang Yiping, Bijun Wang. 2013. "Investing Overseas without Moving Factories Abroad: The Case of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Asian Development Review*, 30 (1) .

③ 祁春凌、黄晓玲、樊瑛(2013):“技术寻求、对华技术出口限制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国际贸易问题》,第4期。

④ 罗伟、葛顺奇(201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及其决定因素—基于水平型投资的研究”,《经济学》(季刊),第4期。

垒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的固定成本差异程度等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机制。王碧珺 (2013)^① 认为由于宏观数据的问题,越来越多的研究从微观层面企业数据入手研究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例如,阎大颖 (2013)^② 使用 Corporate Affiliations 公司的数据库^③,以截至 2012 年 148 家中国跨国公司在境外设立的 600 余个分支为研究对象,采用 logit 回归方法进行了经验分析。作者发现中国企业倾向于投资市场潜力大、劳动力成本低廉、自然资源和战略资源丰富的地区,而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也对中国跨国公司的境外投资有显著影响。然而,该文缺乏稳健性检验,其结果是否可靠需要更多的研究支持。

其三,东道国与母国金融市场特征。在决定因素的分析方面,金融影响成为关注点。景红桥和王伟 (2013)^④ 采用 2003—2010 年中国对 48 个国家直接投资存量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东道国的金融体系的影响,发现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东道国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具吸引力。理由是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相对于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在配置社会储蓄、鼓励竞争、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激励创新等方面有明显优势。但是如此二分法划分金融体系可能过于粗糙。而且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并不一定优于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只是根据各国国情的适合问题。况且即使前者优于后者,对中国投资者的影响机制也不明确,毕竟中国海外投资主要的融资还是在国内。针对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沈军和包小玲 (2013)^⑤ 考察了东道国金融发展和国家风险的作用,发现金融发展指标并不显著。

研究东道国金融体系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可能不如研究母国金融体系的影响具有更大的意义。王伟等 (2013)^⑥ 采用 67 个国家 1990—2009 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母国金融发展对海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影响,作者发现无论是金融发展存量指标还是活跃度指标均可以显著促进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文章使用的金融发展指标有以下四个:私人信贷占 GDP 的比例代表着私人信贷市场的总体发展水平;股市市值占 GDP 的比例代表对资本市场规模的测度;股市交易量占 GDP 的比例;股市换手率代表股票市场的活跃程度。作者并没有在指标的选取上进行充分的说明和稳健性比较,同时这些指标偏重资本市场,与中国以银行体系为主的金融体系差别较大,难以给中国启示。王勋 (2013)^⑦ 则使用更贴近中国实际的综合性指标对 66 个国家 1981—2005 年跨国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金融抑制对海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海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金融抑制采用的是 IMF 金融改革数据库量化七个方面的金融抑制政策的综合指标。但是由于中国的金融抑制是不断降低的过程,对外直接投资反而会增加变得难以理解。从实务层面来看,来自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的三

① 王碧珺 (2013):“被误读的官方数据—揭示真实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国际经济评论》,第 1 期。

② 阎大颖 (2013):“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决定因素”,《国际贸易问题》,第 7 期。

③ 该数据库收录了全球年总销售收入 1000 万美元以上的跨国公司,并提供了跨国公司母公司和所有子公司的经营业务描述。

④ 景红桥、王伟 (2013):“金融体制、法律起源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国际贸易问题》,第 12 期。

⑤ 沈军、包小玲 (2013):“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基于金融发展与国家风险因素的实证研究”,《国际金融研究》,第 9 期。

⑥ 王伟、孙大超、杨娇辉 (2013):“金融发展是否能够促进海外直接投资—基于面板分位数的经验分析”,《国际贸易问题》,第 9 期。

⑦ 王勋 (2013):“金融抑制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国际经济评论》,第 1 期。

位作者徐忠等(2013)^①总结了中资金融机构和中央银行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举措、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工作。

3. 海外投资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国内经济影响的研究围绕技术溢出和就业两个方面进行。其一,对外研发投资对生产率的影响。蒋冠宏等(2013)^②专门针对中国技术研发型海外直接投资进行了实证研究。作者使用2005—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工业企业数据,并利用数据匹配的方法为海外投资企业挑选了可供比较的对照组,发现企业的技术研发型海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生产率,并且这样的提升作用呈倒“U”型的“生产率效应”滞后。作者的这一发现有力地支持了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正面意义,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技术研发型海外直接投资的确能够增加企业的竞争力。然而,存在的问题是这一对生产率的正面效应存在逐年递减的趋势,这可能与我国企业较弱的“学习能力”和“吸收能力”有关系。揭水晶等(2013)^③则是一篇综述性文章,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探讨、获取逆向技术溢出的机理、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性及对母国技术进步的效果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等五个方面对国内相关研究的最新动态进行了综述,并对该领域的未来研究进行展望。作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国内研发与技术进步的双向因果关系可能会导致模型估计中出现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但大部分学者对此采取了规避的态度,作者还建议未来研究需要考虑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异质性。

其二,海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之前就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影响的研究以文字性讨论为主,随着研究的推进,实证性研究逐渐丰富起来。不同类型和动机的海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余官胜和王玮怡(2013)^④利用2003—2010年25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海外投资对不同技能劳动就业的影响,结果发现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海外投资会减少高技能劳动就业,增加低技能劳动就业;而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海外投资则能促进高技能劳动就业,减少低技能劳动就业。但文章对于这一结果的机制解释不够,同时由于就业技能结构本身也会影响海外直接投资的模式,因此可能存在内生性的问题。

(二) 外商直接投资

1. 跨国公司的所有权决策

跨国公司对价值链上不同生产环节所有权的控制受到生产阶段特征、市场需求弹性等因素的影响。从国际经济理论前沿来看,2013年文献主要研究了产品内分工条件下跨国公司的所有权决策。Nunn, Nathan and Daniel Trefler (2013)沿袭Antràs (2003)的理论假设,并且把总部资本进一步分解为建筑物、计算机、汽车等可契约、非关系专用的资本品和机器设备

① 徐忠、徐荟竹、庞博(2013):“金融如何服务企业走出去”,《国际经济评论》,第1期。

② 蒋冠宏、蒋殿春和蒋昕桐(2013):“我国技术研发型外向FDI的‘生产率效应’—来自工业企业的证据”,《管理世界》,第9期。

③ 揭水晶、吉生保、温晓慧(2013):“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我国技术进步—研究动态及展望”,《国际贸易问题》,第8期。

④ 余官胜、王玮怡(2013):“海外投资,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内就业技能结构”,《国际贸易问题》,第6期。

等关系专用的资本品,基于2005年美国企业从220个国家的公司内进口和“一肘之距”进口的5705种产品的面板数据,检验了Antràs和Helpman(2008)的“垂直一体化随着不可契约的总部投入品相对于不可契约的供应商投入品的重要性增加”的理论预测。他们的回归结果与理论预测相一致,当观察不同产业时,总部提供的不可契约投入品重要性增加与更多的FDI和更少的外包显著相关;相比之下,总部提供可契约投入品重要性增加与更高比例的公司内进口相关。^① Antràs和Chor(2013)在一个考虑了投入品生产次序的CES生产函数和考虑了产品质量的CES效用函数理论框架下,建立了一个连续且次序确定的多个生产阶段情形下公司的产权决策模型。该模型的基本结论是,价值链最优的所有权模式严重依赖于生产阶段是序列互补还是序列替代,当最终品制造商面临的需求弹性足够高时,存在唯一的临界生产阶段,之前的所有阶段外包,而之后的所有阶段(如果有的话)一体化。直观上说,当投入品是序列互补时,为了激励上游供应商投资,公司选择放弃对上游供应商的控制权。相反地,当需求弹性足够缺乏时,则存在相反的预期。本文的实证贡献在于提出了两种测度产业在价值链中平均地位的新方法,并且运用美国的关联方贸易数据,估计了美国进口需求弹性,验证了理论模型的预测。^②

2. 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FDI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中FDI质量、FDI相对规模、FDI来源地、FDI引进产品种类和质量,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直是国际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大多数研究都得出了肯定结论。但与以往不同的是,2013年学者们在该领域的研究不但关注了FDI的数量,更加强调了FDI的质量。刘宏、李述晟(2013)^③运用我国1985—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构建VAR模型对FDI、经济增长以及就业这三个变量进行动态计量分析。研究表明:FDI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动态的因果关系,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我国经济增长对FDI的流入具有积极影响,但呈现波动态势。同时FDI带来了就业的增加,与经济增长之间也存在互动的促进关系。鲍洋(2013)^④在Romer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基础上,加入经济结构和制度创新变量,运用“金砖国家”1992—2010年的面板数据回归来检验表明,“金砖国家”引进FDI的经济增长效应均是正向的,由大到小依次是巴西、南非、印度、中国和俄罗斯。“金砖国家”引进FDI经济增长效应的差异主要与引进FDI相对规模和FDI的来源地分布有关。邹建华、韩永辉(2013)^⑤在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模型基础上引入FDI质量,得出外资质量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进而以珠江三角洲九市1999—2010年面板数据回归检验表明,外商投资的质量而不是数量更能推动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增长,单项FDI规模越大,FDI投向高新科技产业与现代服务业部门,FDI企业出口比重越高,FDI承载的技术越先进,就越有利于促进珠三角地区

① Nunn N., Treffer D. 2013. “Incomplete Contracts and the Boundaries of The Multinational Firm.”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94.

② Antràs P., Chor D. 2013. “Organizing the Global Value Chain.” *Econometrica*, 81 (6).

③ 刘宏、李述晟(2013):“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就业影响研究—基于VAR模型”,《国际贸易问题》,第4期。

④ 鲍洋(2013):“金砖国家引进FDI的经济增长效应比较研究”,《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第2期。

⑤ 邹建华、韩永辉(2013):“引资转型、FDI质量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珠三角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国际贸易问题》,第7期。

的经济增长。李怀建、沈坤荣 (2013)^① 通过在产品质量提高模型中引入随时间变化的产品数量 $N(t)$ ，并结合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研究了 FDI 通过产品种类增加和产品质量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上述理论分析基础上，运用 OECD34 个国家 1980—2009 年面板数据回归检验表明，FDI 通过上述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于 OECD 国家中低收入组国家，产品种类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高收入组国家，而产品质量提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则是高收入组国家大于低收入组国家。

3. FDI 与进出口的关系

FDI 显著地促进了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并没有导致出口贸易条件恶化。长期以来，FDI 与进出口的关系是学者们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但在 FDI 产生贸易创造效应还是贸易替代效应，导致贸易条件恶化还是改进等问题上，学者们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在 2013 年文献中，学者们在对贸易品质量和分行业实证分析中基本上都得出了积极的结论。李坤望、王有鑫 (2013)^② 在阐述 FDI 影响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直接、间接和乘数作用等 3 个微观机制的基础上，利用 1999—2007 年产品出口贸易和 FDI 数据，运用系统 GMM 实证检验表明，FDI 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而且外商投资对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要强于港澳台投资；进一步对行业分组回归发现，资本密集型行业和高外资进入行业中 FDI 的存在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而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低外资进入行业中 FDI 的存在不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此外，研发密度、人均工资等也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起到积极的作用，而资本劳动比的影响则恰好相反。王文治、扈涛 (2013)^③ 建立了我国 SITC 五位数分类商品与制造业 28 个行业对照表，基于 2000—2010 年微观贸易数据测算了中国制造业 28 个行业的价格贸易条件，并采用动态面板 GMM 估计从行业层面分析了 FDI 对制造业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FDI 与中国制造业价格贸易条件正相关，FDI 在促进中国制造业出口不断增加的同时，并没有导致其价格贸易条件持续恶化，也不会使中国制造业陷入“贫困化增长”，特别是 FDI 集中流入的中高技术含量行业的贸易条件持续改善，而且这些行业在制造业产出中的比重逐年上升。

4. FDI 技术外溢效应

FDI 技术外溢效应受到当地条件制约，而且存在着地区和产业差异。FDI 的技术外溢效应是国际直接投资文献中研究最多的题目之一，2013 年的实证研究在方法和结论上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进步。林季红、郭志芳 (2013)^④ 采用 1993—2008 年中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回归表明，FDI 可以通过提高生产率而非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但 FDI 外溢效应的实现又受到当地条件的制约。因此，建议政府应消除各类障碍，促进本地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系，充分发挥 FDI 的联动效应，同时还应改善本地公司可利用资源，包括中间投入、技术以及资金等，特别是要为新兴产业和高技术行业的建立提供特别的融资支持。徐清 (2013) 选取 2002—2009 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回归分析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 FDI 的异

① 李怀建、沈坤荣 (2013)：“FDI、内生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基于 OECD 国家的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世界经济研究》，第 2 期。

② 李坤望、王有鑫 (2013)：“FDI 促进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吗？—基于动态面板系统 GMM 方法的研究”，《世界经济研究》，第 5 期。

③ 王文治、扈涛 (2013)：“FDI 导致中国制造业价格贸易条件恶化了吗？—基于微观贸易数据的 GMM 方法研究”，《世界经济研究》，第 1 期。

④ 林季红、郭志芳 (2013)：“金融市场、FDI 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世界经济研究》，第 5 期。

质性。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东部地区的外资利用以能带来更大技术溢出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水平型 FDI 为主,我国中部地区 FDI 性质不明确,而西部地区的外资利用则以垂直型为主。门槛回归结果显示,我国各地区不同的金融发展水平、对外依赖度以及国家干预程度对流入我国 FDI 性质都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罗良文、李珊珊(2013)^① 基于 DEA 非参数方法测算了我国各地区 1995—2010 年的 Malmquist - Luenberger 全要素碳排放绩效指数,并利用我国 28 个省级动态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方法(GMM)估算出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考虑非期望产出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进而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构建了 FDI 对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影响的动态计量方程。研究结果显示: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的 FDI 促进了技术进步,抑制了技术效率的改进,中部地区的 FDI 促进了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改进,而西部地区的 FDI 技术效应不显著。华广敏(2013)^② 引入生产制造成本和创新力作为中介变量,基于 2000—2009 年中美高技术服务业和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回归对中美高技术服务业 FDI 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路径进行比较分析。实证研究表明,美国高技术服务业 FDI 通过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创新能力对制造业效率均有显著的正效应,而中国只有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FDI 通过提高创新能力对制造业效率影响显著,其他变量均没有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我国应借鉴美国服务业的成功经验,发挥高技术服务业 FDI 对制造业效率的促进作用。

5. 跨国公司 FDI 决策的影响因素

制度环境、规模经济、组织成本和运输成本影响了跨国公司的 FDI 决策。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一直以来都是跨国公司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在 2013 年文献中,除了关税、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市场需求等传统影响因素以外,学者们还从异质性企业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廖利兵、曹标(2013)^③ 通过梳理一般产业均衡模型分析企业选择出口还是水平型 FDI 的内在机制,在此基础上采用 1992—2010 年美国、德国、英国、日本、韩国、香港、澳大利亚等 7 个国家(地区)制造业面板数据回归研究了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模式选择。实证分析表明,工厂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对样本国家(地区)制造业企业以出口还是水平型 FDI 方式进入中国市场起重要作用,而关税壁垒、公司规模经济、税收对此没有显著影响;采用基尼系数和 GDP 衡量中国实际市场需求时发现,中国市场变化没有促使样本国家(地区)制造业企业由出口方式转向水平型 FDI。李国学(2013)^④ 探讨了制度质量、FDI 生产力水平及其国际投资模式的选择问题,认为企业的国际投资活动总是地理嵌入和网络嵌入在一个国家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不但制约着 FDI 所获得的生产力水平,而且还影响了产业的组织成本,进而影响了企业的国际投资模式的选择。

6. FDI 对环境的影响

FDI 对环境污染存在腐败门槛效应,具备“污染避难所”论和“污染光环”论的双重特征。相对于其它研究议题来说,FDI 对环境影响的研究相对较新。由于不同类型 FDI 的差异和产业特征的差异,学者们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从 2013 年文献来看,FDI 对环境污染的

^① 罗良文、李珊珊(2013):“FDI、国际贸易的技术效应与我国省际碳排放绩效”,《国际贸易问题》,第 8 期。

^② 华广敏(2013):“高技术服务业 FDI 对中美制造业效率影响的比较分析—基于中介效应分析”,《世界经济研究》,第 3 期。

^③ 廖利兵、曹标(2013):“企业出口与水平型 FDI 内生选择机制分析”,《世界经济研究》,第 3 期。

^④ 李国学(2013):“制度约束与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国际经济评论》,第 1 期。

总量增长,但强度日趋下降。李子豪、刘辉煌(2013)^①以1995—2008年中国29个省级地区和2004年120个地级城市为研究对象,分别用门槛面板回归和截面交叉项估计的方法,实证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环境污染的腐败门槛效应以及地区腐败本身对环境的影响。研究表明,FDI对环境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腐败门槛效应。在地区腐败水平较低时,FDI改善了当地的环境质量;而当地区腐败水平较高时,FDI则加剧了当地的环境污染;地区腐败本身也直接增加了中国各地区的污染排放。张宇、蒋殿春(2013)^②以我国各地区大气污染排放为切入点,在剔除经济规模因素的情况下定义了地区大气污染排放(平均)强度,并通过对该指标的分解重新构建了地区与大气污染相关的产业结构指标和环保技术指标,基于2001—2009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运用联立方程模型,对FDI的环境效应以及政府监管在其背后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进行了系统性的检验。结果表明,外资企业的进入同时具备“污染避难所”论和“污染光环”论的双重特征,在引起我国产业结构向高污染行业转移的同时显著促进了当地和其他地区的环保技术应用;同时FDI的存在弱化邻近地区的环境监管同时对当地的环境监管起到明显的强化作用。李晓钟、刘振宇(2013)^③基于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利用我国制造业1999—2009年时间序列数据,从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两个层面、分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两个产业,比较FDI对我国劳动密集型工业和技术密集型工业碳排放的影响。实证结论表明,外资流入导致我国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增加,但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则是减少的,且劳动密集型产业减少的程度高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外资流入对我国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都产生降低的影响,且劳动密集型产业降低的程度高于技术密集型产业;若碳排放强度降低幅度进一步提高,则FDI有可能促使我国碳排放曲线出现降低的“拐点”,即出现库茨涅茨倒U型曲线的现象。

7. FDI与资本流动

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本来源,短期内FDI流入规模与其它融资渠道存在着替代效应,长期内东道国经济发展将会促进FDI的流入。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受到多种因素影响,2013年文献主要考察了金融发展和国际援助对FDI流入规模的影响。陈万灵、杨永聪(2013)^④基于我国2001年到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和OLS回归模型探讨了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对FDI流入规模的影响。研究表明,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与FDI流入规模之间表现出了较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我国的金融抑制现象仍然较为严重,迫使众多民营企业因为融资难而寻求与外资的合作,从而推动了FDI的大规模流入。王翬、甘小军、刘超(2013)^⑤借鉴Selaya(2008)的方法,在Solow模型中引入援助变量,将援助分为物质资本(生产部门援助)投入形式和补充要素(经济基础设施援助、社会基础设施援助)投入形式,阐述了援

① 李子豪、刘辉煌(2013):“外商直接投资、地区腐败与环境污染—基于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第7期。

② 张宇、蒋殿春(2013):“FDI、环境监管与工业大气污染—基于产业结构与技术进步分解指标的实证检验”,《国际贸易问题》,第7期。

③ 李晓钟、刘振宇(2013):“FDI对我国制造业碳排放影响分析”,《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第1期。

④ 陈万灵、杨永聪(2013):“区域金融发展与FDI流入规模的实证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国际经贸探索》,第4期。

⑤ 王翬、甘小军、刘超(2013):“国际双边发展援助对FDI的影响研究—基于17个OECD国家对华发展援助的实证”,《国际贸易问题》,第6期。

助影响 FDI 的理论机制。基于 1992—2010 年间对华援助累计额超过 3 亿美元的 17 个 OECD 国家相关数据,运用 FDI 引力模型分析了双边发展援助对 FDI 的短期、中期和长期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在短期内,17 个 OECD 国家对华发展援助挤出了这些国家对中国的 FDI,但在中长期促进了这些国家对中国的 FDI,并且时间越长,促进效应越强。

二、跨境间接投资

(一) 外汇储备管理与投资

关于外汇储备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着需求、币种结构、冲销的有效性和成本、投资行为、管理战略等问题展开。具体如下:

1. 外汇储备需求

基于金融稳定视角,谷宇(2013)^①通过扩展外汇储备的缓冲存货模型构建了中国外汇储备需求模型,分析了产出、内外部流动性、外汇储备持有成本及波动成本等因素对外汇储备需求的影响。研究发现,产出、内外部流动性、外汇储备波动成本对外汇储备需求存在正向冲击,而外汇储备持有成本对外汇储备需求存在负向冲击,即中国外汇储备在长期内受预防性需求的影响。Bianchi, Hatchondo 和 Martinez (2013)^②指出,当前国际资本流动呈现出两个明显特征:一是负债的政府持有大量外汇储备,其发行债务的收益率要显著高于其持有外汇储备的投资回报率;二是外国投资者购买国内资产和国内投资者购买外国资产的行为都是顺周期的,且在金融危机期间跨境资本投资均处于停顿状态。他们据此提出了一个主权债务违约内生化的动态模型,分析了外汇储备积累与政府债务滚动风险的关系。政府面临着外汇储备的缓冲保险收益与债务成本之间的权衡。因为违约风险是逆周期的,政府在经济繁荣和融资成本低时积累储备和债务,而在经济危机和融资成本高时,选择用外汇储备来偿还债务和平滑消费。周期长的政府债券、逆周期的违约风险升水、资本流入的突然停止对于储备最优规模产生重要影响。Shrestha (2013)^③基于面板数据,发现泰国、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持续积累外汇储备对国内银行部门的流动性资产和储蓄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2. 外汇储备的币种构成

Sheng (2013)^④运用状态空间模型和贝叶斯估计方法,估算了中国 2000—2007 年期间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发现中国外汇储备多元化取得了长足进展,美元资产比重明显下降,而

① 谷宇(2013):“金融稳定视角下中国外汇储备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兼论外汇储备短期调整的非对称性”,《经济科学》,第 1 期。

② Bianchi Javier, Juan Carlos Hatchondo, Leonardo Martinez. 2013. “International Reserves and Rollover Risk.” *IMF Working Paper* WP13/33.

③ Shrestha Prakash Kumar. 2013. “Banking Systems, Central Banks and International Reserve Accumulation in East Asian Economies.” *Economics*, 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 No. 2013 - 14.

④ Sheng Liugang. 2013. “Did China Diversify Its Foreign Reserves?”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28.

欧元资产的比例显著上升。罗素梅、陈伟忠和周光友(2013)^①通过构建基于多层次需求的货币性外汇储备币种结构优化的AHP模型,测算出外汇储备货币性资产的最优币种权重。研究发现,美元在币种权重中的领导地位难以撼动,货币性存款在资产组合权重中也具有明显优势。

3. 外汇冲销的有效性与成本

王永中(2013)^②基于对中国外汇冲销实践的考察,系统论证和综合测算了中国外汇冲销的有效性、成本与可持续性,为评价中国外汇冲销的绩效及可持续性提供了一个可进行成本收益权衡的分析框架。他认为,中国的外汇冲销和资本管制是大致有效的,但有效性程度不断降低;人民币汇改以来,外汇冲销成本持续高于外汇储备的收益,冲销处于持续亏损状态;冲销成本与汇率风险已对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构成严重威胁,中国人民银行在2007-2008年出现亏损;中国货币当局的外汇冲销操作不满足可持续性条件,中央银行通过期限转换操作(借短投长)才得以在一些年份勉强达到冲销可持续条件。

4. 外汇储备的投资行为

王宇哲与张明(2013)^③基于2002年至2012年的年度数据,通过比较美国长期国债市场上主要外国投资者的不同行为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不同行为特征的可能影响因素,得出了如下主要结论:由历史原因形成的市场势力和主动的资产配置策略,以及金融市场的风险与收益变化,是导致外国投资者不同行为特征的主要原因。

5. 外汇储备的投资管理战略

Wang and Freeman(2013)^④分析了中国外汇储备的币种和资产构成、投资收益、持有成本与最优规模,探讨了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外汇储备投资的挑战和机遇,提出了促进外汇储备多元化的政策建议。张斌(2013)^⑤指出,中国外汇储备管理面临两个突出的挑战:一是把超出合理规模的外汇储备还汇于民;二是如何实现外汇储备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他认为,不宜为外汇储备投资设立国家战略目标。过度强调国家战略目标,可能会造成大量政府部门滥用外汇储备资产的困境。

(二) 主权财富基金

2013年中国对主权财富基金(SWF)的研究包括对全球主权财富基金投资行为的分析,对透明度的分析,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待遇、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的市场影响等。

1. 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行为

目前国际较为成功的主权财富基金的建立国家包括挪威、新加坡、俄罗斯,石油生产国家以及亚洲部分国家。现有文献也主要集中在对这些国家主权财富基金情况的介绍,投资及

^① 罗素梅、陈伟忠、周光友(2013):“货币性外汇储备资产的多层次优化配置”,《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6期。

^② 王永中(2013):《中国外汇冲销的实践与绩效》,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③ 王宇哲、张明(2013):“美国长期国债市场上主要外国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比较”,《国际金融研究》,第11期。

^④ Wang Yongzhong, Duncan Freeman. 2013.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nd China's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Management”, *Asia Paper*, 7 (2) .

^⑤ 张斌(2013):“外汇储备的资产属性、改革方案与还汇于民”,《国际经济评论》,第6期。

管理经验的总结,比较这些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的异同等方面。

国内对具体主权财富基金的讨论包括对挪威,新加坡,中东模式等。叶楠(2013)^①在回顾了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的发展历程及变革,分析了其投资策略,将其区分为谨慎保守和联合投资两种。对于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两次变革的动因,作者认为基金资历尚浅,西方国家的“歧视”,俄罗斯国内市场庞大,但投资环境不佳等都是造成现有投资策略的原因。姜英梅(2013)^②讨论了海湾国家石油美元的投资模式,包括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姜英梅认为石油出口国的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具有如下特点:一是由被动型投资转向主动型投资,投资对象从低风险低收益的资产(如债券和指数基金)转向兼顾盈利性的目标;二是投资领域由金融和房地产转向高科技企业;三是货币构成多元化;四是投资区域多元化。

张海亮等(2013)^③以2009—2011年全球主权财富基金2000余条海外投资项目数据为依据,首先分析了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空间分布特征;其次运用空间计量回归对其投资分布空间关联性进行测度;然后以挪威为例,探寻主权财富基金的区域投资路径及规律,并基于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对路径成因进行一般分析。结论表明,主权财富基金投资区域存在空间集群现象,这可以规避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降低开拓新市场的成本以及发挥技术管理空间外溢效应。同时,“广泛布点,局部扩散”和“局部布点,广泛扩散”这两种投资路径有助于指导我国主权财富基金投资实践。

张海亮等(2013)^④在识别经济周期的基础上利用夏普指数和 β 系数,分析不同经济周期下的行业特征;接着,分投资偏好系数相同和不同两种情况给出了不同经济周期下中国SWF的行业选择;最后,结合我国主权财富基金的行业配置现状,给出不同经济周期下中国主权财富基金行业选择相应的调整趋势和方向。

国内对国外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情况的研究受制于信息的公开程度和数据的可得性,难以进行完整的量化分析,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2. 主权财富基金的透明度

透明度问题是主权财富基金监管的核心问题。透明度对于SWF获得国内和国际合法性、商业优势、提高声誉有积极影响,也有利于主权财富基金之间的沟通。

同投资策略和透明度相比,市场环境对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收益的影响更大。对于主权财富基金的透明度问题,张海亮(2013)^⑤利用logistic回归和多水平logistic回归研究了信息披露和投资策略对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收益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披露越多的基金,收益表现越不好,说明信息披露越多,给市场投机者利用和挖掘的空间越大,好的投资策略可能在国际市场套利面前,也将获利甚微;2008—2011期间,在控制了宏观经济变量后,投资策略对收益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市场环境是影响投资收益的主要因素,积极投资策略并不能获得更好收益。张海亮等人的研究突破了以定性的方法讨论主权财富基金的治理结构问题。

① 叶楠(2013):“探析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的变革与投资策略选”,《俄罗斯研究》,第4期。

② 姜英梅(2013):“海湾国家石油美元投资模式”,《阿拉伯世界研究》,第1期。

③ 张海亮、周卫江、王亦奇(2013):“全球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空间分布、路径选择”,《经济问题》,第5期。

④ 张海亮、钱惠、王亦奇(2013):“基于经济周期的我国主权财富基金行业选择”,《上海金融》,第2期。

⑤ 张海亮、薛琰如、王亦奇(2013):“信息披露、投资策略与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收益”,《中国经济问题》,第3期。

王乐 (2013)^① 则借助 Truman 记分表定义主权财富基金透明度指数, 并以此为据评估、解读主权财富基金的信息披露状况。随后, 他构建了主权财富基金与东道国之间的信息博弈模型, 从理论层面进一步探讨主权财富基金对信息披露的偏好以及东道国相应的政策选择。最后, 他还分析了影响主权财富基金透明度的因素, 并据此提出改善透明度的政策建议, 包括: 改善主权财富基金母国政府的透明度; 优化主权财富基金的公司治理。另外, Truman (2013)^② 更新了主权财富基金透明度的打分标准并对多个国家进行了排序。

3. 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待遇

主权财富基金因为与国家主权关系密切, 在对国外投资时面临其他机构投资者不一样的投资待遇。特别是“国家安全”方面的指责, 对 SWF 的投资形成了较大的影响; 各国国内的投资法规也出现了对 SWF 的不同态度。国内的研究对于 SWF 面临的投资待遇有较多讨论, 这包括针对 SWF 的国际规则, 投资接受国的政策, 母国的政策协调三方面。

主权财富基金自发合作, 有助于减少投资壁垒。对于 SWF 可能遭遇的投资壁垒, 张海亮等 (2013)^③ 提出全球主权财富基金应自发进行合作, 以切实可行的联盟形式提供可信承诺, 向东道国发出积极信号, 约束自身投资行为, 维系联盟和个体的国际声誉。本文给出了全球主权财富基金投资合作的制度安排, 并结合合作博弈和投资选择模型, 给出了制度安排需要满足的临界条件。我国应在这一规制过程中扮演积极角色, 以更好地融入国际游戏规则中为我国主权财富基金对外投资战略服务。

4. 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的市场影响

对于 SWF 的投资对于被投资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 Bortolotti (2013)^④ 等的结论是, 主权财富基金公司的治理往往会影响公司的价值, 他们的研究使用 SWF 对 1018 个上市公司的股权投资样本, 和私人金融机构在 1980—2012 年间 5975 起交易的样本。结果说明主权财富基金在投资公告期的收益高于普通值, 但低于私人金融机构的这个值约 2.67 个百分点。没有证据说明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公司长期中的股价表现与私人部门的表现有显著差异。

张东 (2013)^⑤ 研究表明, 主权财富基金对投资对象产生了积极影响, 其相对较大比例的股权投资有利于投资对象公司价值的提升。因此, 比较了主权财富基金积极投资与消极投资对投资对象公司价值影响的不同, 结论表明主权财富基金的积极投资更加有利于其公司价值的改进, 那些认为主权财富基金大比例股权投资有损投资对象利益的观点没有得到证实。

另外, 在跨境资本流动方面, 张明与谭小芬 (2013)^⑥ 通过构建 2000 年 1 月至 2012 年 6 月的非限制性 VAR 模型, 分析了中国所面临短期资本流动的主要驱动因素。主要结论包括: 首先, 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是最重要驱动因素; 其次, 与常规印象不符, 人民币利率上升会

① 王乐、张翼 (2013): “主权财富基金透明度研究”, 《上海金融》, 第 10 期。

② Allie E. Bagnall, Edwin M. Truman. 2013. “Progress on Sovereign Wealth Fund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An Updated SWF Scoreboard.”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apers*, No. PB13-19.

③ 张海亮, 郭明 (2013): “可信承诺、合作联盟与主权财富基金对外投资”, 《经济研究参考》, 第 62 期。

④ Bernardo Bortolotti et al. 2013. “The Sovereign Wealth Fund Discount: Evidence from Public Equity Investments.” *Baffi Center Research Paper* No. 2013-140.

⑤ 张东 (2013): “主权财富基金对投资对象公司价值的影响”, 《金融理论与实践》, 第 1 期。

⑥ 张明、谭小芬 (2013): “中国短期资本流动的主要驱动因素: 2000—2012”, 《世界经济》, 第 11 期。

导致短期资本持续流出；再次，与房地产价格相比，中国股市价格指数是更重要驱动因素；第四，中国经济增长率在一定时滞（半年）后会影响短期资本流动；第五，中国的短期资本流动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我强化特征。上述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为更好地应对短期资本流动，中国政府应加快人民币汇率与利率形成机制改革，并保持适当的资本账户管制。

三、跨国公司

2013年，中外学术界对跨国公司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策略及其效应、跨国公司成长经验的归纳与理论梳理、企业社会责任、技术创新等方面，而中国学者自然对如何培育中国跨国公司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一）跨国公司东道国投资方式及其溢出效应的研究

人力资本流转是跨国公司产生溢出效应的渠道之一。刘青、张超和吕若思（2013）^①基于2000年、2002年、2004年的全国民营企业主抽样调查数据，从人力资本创造与流转的视角，实证研究了跨国公司在华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影响因素和作用渠道。他们利用OLS回归和Treatment Effect非参数估计，得出的研究结论表明，民营企业主的跨国公司工作经历对所创立企业的经营业绩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证实了跨国公司在华存在通过人力资本创造与流转机制的溢出效应。同时，制度环境对有效收获人力资本溢出也有重要影响。

跨国公司的跨国经营可以包括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两大方式。张庆昌、蒋殿春和张宇（2013）^②将美国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或贸易方式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们借助多个国家的制造业行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用以解释美国跨国公司服务中国经济的行为。该研究认为，美国服务中国市场的方式主要以混合型直接投资为主，这是美国跨国公司更偏爱出口贸易的主要原因。此外，该论文作者还发现，运输成本越大、生产率异质性越大和工厂水平固定成本越小，跨国公司就会更加偏爱直接投资而不是出口贸易。通过这一研究，该文作者认为，关于美国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方式的研究，为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选择和引资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基础。由于中国沿海城市工人工资大幅上涨，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意味着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终结。而论文考察期内廉价劳动力是吸引美国外资的主要因素之一。显然，美国面对工资的持续上涨，势必对在华经营策略进行调整。中国可以引导美国跨国公司将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业到中部地区，通过实现产业在东中西部三类地区的重新布局，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的延续。这样，中国在引进外资的主动权方面会逐渐加大，可以有选择地引进外资和制定相应的引资政策。

跨国公司对本土企业可能产生“挤出效应”。邢夫敏（2013）^③认为，在FDI主导型产业集群中，跨国公司可能给本土企业带来“挤出效应”，并使地方产业升级面临困境。地方政

① 刘青、张超、吕若思（2013）：“跨国公司在华溢出效应研究：人力资本的视角”，《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9期。

② 张庆昌、蒋殿春、张宇（2013）：“美国跨国公司服务中国市场——为什么偏爱出口贸易？”，《经济学》，第1期。

③ 邢夫敏（2013）：“FDI主导型产业集群特征与本土企业产业升级对策”，《科技进步与对策》，第2期。

府和企业如何突破产业升级障碍、寻求产业升级路径将成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邢夫敏以苏州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为例,研究FDI主导的外生型产业集群特征,并提出本土企业实现产业升级的三大对策:树立区域自主创新信心;构建区域集群创新网络;设计激励制度,培育本土企业创新能力。

Liao和Wei(2013)^①通过对我国苏州市的信息和通信领域的全面调查,认为中国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技术关联度,与跨国公司在我国供应链及其客户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作用。当然,中外企业间的技术差距使得这种联系必然受到一定制约。Yang, Martins and Driffield(2013)^②通过对1997—2007年间投资于46个国家的跨国公司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程度与其企业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加强稽核制度建设,有助于缓解跨国公司的转移定价行为。黄敏(2013)^③对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原理基础上,分析了跨国公司成功避税占据博弈优势的原因。并通过构建策略性博弈论模型,分析上我国稽核对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策略的影响,分析结论是稽核手段越成熟,成功率越高,处罚越严厉,跨国公司运用转移定价的风险就越大,在一定程度上会控制其对转移定价的滥用。最后,结合我国对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管制的现状,提出完善我国对转移定价管制的五点建议:分别是创造有效外部市场、立法纳税人举证责任制、合理运用税收筹划、完善预约定价制度、扩大国际合作,以此在博弈中和跨国公司取得双赢的局面。

对华直接投资以获取中间品,是跨国公司优化产业链配置的举措之一。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分工的不断深化,跨国公司往往选择优化资源的全球配置,以实现持续降低采购、生产、销售成本的目的。他们将产品研发和最终消费两端继续保留在发达国家,而将中间品的组装、加工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王若冰(2013)^④认为,这种中间品的转移既可以通过跨国公司到发展中国家进行垂直型FDI也可以通过直接将生产订单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独立供应商的方式完成。然而大多数来华贸易的跨国公司都采取了前一种方式来获取中间品。

(二) 跨国公司成长中企业组织的研究

跨国公司对其母国的综合实力与发展水平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何支持本国跨国公司的成长问题,已经成为类似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国家非常重要的战略性任务,这也是本学科研究致力研究一大问题。在陈建勋和刘黎(2013)^⑤的一项研究中,他们从网络关联和组织演化两个方面,通过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对欧美跨国公司的成长经验进行归纳和理论梳理。其研究表明:首先,在网络关联方面,欧美跨国公司的成长表现为在东道国形成的

① Liao F. H., Wei Y. H. D. 2013. "TNCs' Technology Linkages with Domestic Firms: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ICT Industry in Suzhou, China."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53 (6).

② Yong Yang, Pedro S. Martins, Nigel Driffield. 2013. "Multinational Performance and the Geography of FDI." *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 23 (5).

③ 黄敏(2013):“跨国公司避税与我国税务机关反避税—转移定价策略性博弈分析”,《时代金融》,第14期。

④ 王若冰(2013):“对跨国公司海外产业转移决策的研究”,《中国证券期货》,第8期。

⑤ 刘建勋、刘黎(2013):“基于网络关联与组织演化双重视角的中国跨国公司成长策略研究—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借鉴与启示”,《财贸研究》,第1期。

社会网络广度的不断扩展与深度的不断加强,并且作为网络中心的母国或母公司在加强网络深度时更侧重于对发达区域的投资;其次,在组织演化方面,欧洲和美国的跨国公司的组织模式选择存在差异性,欧洲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信息沟通存在一定的困难,从而知识在子公司与子公司间的转移存在一定的障碍,而美国跨国公司由于母公司处于主导地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缺少类似欧洲跨国公司子公司关系间存在的缺陷;再其次,结合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与发展现状,他们从网络关联程度与组织模式选择两个方面提出中国跨国公司成长的相关策略,并提出了新形势下对海外子公司和分支机构应加强控制等政策建议。

(三) 中国跨国公司培育与发展的研究

中国学术界对跨国公司研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培育和发展中国本土跨国公司服务,将跨国公司的发展规律与趋势更快更好地应用于中国企业身上,而现阶段以华为、联想为代表的中国跨国公司发展状况如何,也是跨国公司研究领域的一大热点。在“走出去”战略指导下,联想、海尔、华为等我国优秀民营企业通过并购、海外投资建厂、布局海外营销和研发网络等多种方式实现了其国际化目标,成为跨国公司。而这一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就是在海外设立总部或总部式的分支机构,协调人力、资本、产品、服务、技术和信息等要素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跨境流动,甚至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有效配置,有一些学者致力于该领域的研究。

张永庆、李浩和赵清斌(2013)^①通过中国民营企业海外战略、国际化方式、海外经营区位三者与构建海外总部的关系,对联想、海尔、华为等企业的海外总部构建的具体模式进行了探索,总结分析出有利于我国民企真正实现“走出去”战略的有效路径。发挥总部经济整合协调跨国际或全球生产要素的综合效应,对于突破我国民营企业海外经营过程中面临的目标市场壁垒,改变我国企业处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现状,实现产业升级,以及科学把握海外投资区位选择的战略方向,都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张永庆等认为,不同的海外战略选择,我国民营企业海外总部的构建呈现明显的差异,其所构建的海外总部型机构也承担着不同的目标,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其中包括:一是“高屋建瓴式”总部:联想通过并购直接实现全球总部再布局;二是“步步为营式”总部:华为自主构建海外研发和营销总部网络;三是“自成一体式”总部:例如,海尔在北美高端市场同时建立总部和工厂。

在中国跨国公司群体中,华为通过长期的探索与实践,已经发展成为国际一流的高科技型跨国公司。作为案例研究,王子先(2013)^②对华为开放式创新战略的成功经验进行了分析,认为华为最大的成功经验,在于其不断地寻找适应经济与科技全球化的路径,以积极开放式的技术创新政策推动其企业运营的国际化发展。

戴万稳、陈晓燕(2013)^③基于Porter提出的竞争优势理论模型,就中韩跨国公司海外扩张活动的竞争优劣势和动机进行了系统的甄别,理清了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兴起及其海外扩张战略背后的特定逻辑。就中韩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动机而言,其间的相似点为均与本土

^① 张永庆、李浩、赵清斌(2013):“‘走出去’战略下我国民企海外总部构建模式研究”,《管理科学》,2013年第3期。

^② 王子先(2013):“华为:开放式创新打造世界一流高科技型跨国公司”,《全球化》,第3期。

^③ 戴万稳、陈晓燕(2013):“基于竞争优势架构的中韩跨国公司海外扩张动机比较研究”,《亚太经济》,第4期。

市场自然资源的短缺、打造全球品牌形象以及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相关,不同之处在于韩国跨国公司海外扩张的动机中更多的是降低成本和市场渗透,在中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动机中,考虑更多的则是市场规模、市场占有率等因素。基于比较研究结果,他们对中国本土跨国公司海外扩张活动的战略性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策略性建议。

(四) 跨国公司社会责任、企业文化建设等问题的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法治的发展,控制跨国公司犯罪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新问题。要有效控制跨国公司犯罪,对国家、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的权责方面,都面临观念和制度上的挑战和创新。对跨国公司犯罪进行有效的法律控制,是国际法治的新课题,也对各国国内法治产生重大影响。要有效控制跨国公司犯罪,就必须规制国家控制跨国公司犯罪的权利和责任。正是在此这种形势下,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犯罪研究明显加强。

2011年,虽然苹果公司产品在全世界尤其是中国销量大涨,但对于苹果公司来说,由于“毒苹果事件”浮出水面,使得该公司供应链上的社会责任问题一个社会关注焦点。蒋艳艳(2013)^①认为,苹果公司在“毒苹果事件”中采取的“鸵鸟政策”,不仅反映出其供应链社会责任的缺失,更折射出其背后的伦理问题。因此,对跨国公司而言,将伦理质量理念纳入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体系之中,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任务。

李嘉(2013)^②通过对跨国公司企业文化建设的案例的研究,认为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应尊重和包容不同的文化背景,树立开放性的企业文化理念,重视文化整合风险并制定针对性的风险防范措施;吸收其他企业文化中的优点,实现不同企业文化的共处、协调和融合,求同存异,不断丰富企业文化的内涵;定期审视和评估海外子公司文化融合工作的问题,不断完善文化融合工作流程,建立循序渐进、循环往复的企业文化融合工作机制。

四、国际投资协定

2013年,国际投资协定领域的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国际投资协定理论、国际投资仲裁、区域投资协定和双边投资协定等方面。

(一) 国际投资协定理论研究的升华

国际投资法是一个复杂和充满活力的领域。然而,它的历史意义未得到充分研究。Miles(2013)^③的新书探讨了国际投资法的历史演进,作者以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初主要国家的商业与政治扩张政策为视角,审视了国际投资法的起源以及在现今外国投资保护法中仍持续具有共鸣的这些渊源。特别是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活动、格劳秀斯的论文以及二战前国际投资争端的活动的探讨,为目前关于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相互影响、投资者与国家仲裁机制的

① 蒋艳艳(2013):“从‘毒苹果事件’审视苹果公司的供应链社会责任”,《河南社会科学》,第10期。

② 李嘉(2013):“跨国公司企业文化建设经验与启示”,《中外企业文化》,第22期。

③ Miles Kate. 2013. *The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系统性设计以及国际投资法中的环境问题的处理等争论提供了洞见。

Salacuse (2013)^① 采用综合分析的方法探讨了有关国际投资的法律, 其独特地将适用于国际投资的三个层面的法律结合在一起分析, 并揭示出三个层面法律的互动和潜在的冲突。在此基础上, 对投资东道国与母国应如何运用其法律制度鼓励和规范国际投资进行了论证。

Roberts (2013)^② 认为国际投资协定体制就像是一个鸭嘴兽。很明显, 投资协定是国际公法生物。然而, 国际投资协定与国际公法条约显著不同, 因为绝大多数国际投资协定允许投资者基于程序规则和执行机制直接对东道国提起仲裁请求。国际投资协定体制将国际私法纠纷解决机制移植到国际公法条约中。通过上述研究, 本文为提出投资条约体制是什么或应该成为什么的规范性理论提供了基础。

(二) 国际投资仲裁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仲裁庭对国际投资法核心规则的“扩张解释”, 促使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减少在仲裁庭面临的国际索赔的法律风险, 实施旨在退出这一机制的策略。Lavopa 和 Barreiros 等 (2013)^③ 在评估了发展中国家的“退出战略”的利弊之后, 认为发展中国家通过重新谈判寻求减少国际投资仲裁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更好的方式, 并得出结论认为, 国家寻求退出双边投资协定 (BIT) 体制的最合理的方式似乎是留在里面。

Vadi 和 Gruszczynski (2013)^④ 指出, 国际投资协定仲裁庭日益触及水供应、公共卫生或文化政策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仅是理论上的, 而且涉及国际投资法和仲裁作为多层次治理的一个部分的合法性。研究这些问题有助于一般国际法和投资保护的结盟, 加强国际投资法为社会财富贡献的能力。文章提出, 虽然完全遵从国内措施标准将违反国际投资法的根本目的, 但过度干涉的标准也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据此, 作者认为 WTO 内形成的标准或可作为国际仲裁庭参考的模式。

(三) 区域投资协定: 聚焦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TTIP) 谈判

Cai (2013)^⑤ 认为, 在过去的六十年, 国际投资法的多边化见证了反复的失望。目前 TPP 中的投资章节谈判, 可能会带来这一进程的新承诺。TPP 谈判各方有必要对这样的近代历史有正确的认识。TPP 谈判进行的背景与以往的多边投资协定谈判有很大的不同。因此,

① Salacuse Jeswald W. 2013. *The Three Law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② Roberts Anthea. 2013. "Clash of Paradigms: Actors and Analogies Shaping the Investment Treaty System."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07 (1).

③ Lavopa Federico M., Barreiros Lucas E., Bruno M. Victoria. 2013. "How to Kill A Bit and Not Die Trying: Legal and Political Challenges of Denouncing or Renegotiating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16 (4).

④ Vadi Valentina, Gruszczynski Lukasz. 2013. "Standards of Review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Arbitration: Multilevel Governance and the Commonwea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16 (3).

⑤ Cai Congyan. 2013. "Trans - Pacific Partnership and the Multilater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Journal of East Asia and International Law*, 6 (2).

可以认为, TPP 谈判会圆满结束, 并可能对国际投资法的多边化产生深远的影响。由于 TPP 谈判会有多边的影响, TPP 的谈判方已经提出了一些新的举措, 这可能有助于缓解在过去二十年的“合法性危机”。这些措施包括特殊和差别待遇的新原则、促进投资的可操作规定、关于跨国公司行为守则的附带协议以及复审仲裁裁决的上诉机制。

陈虹、韦鑫等(2013)^①对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对 TTIP 谈判对中国经济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进行了研究。欧盟美国间进行的 TTIP 谈判主要侧重于非关税壁垒的消减, 核心议题包括政府采购市场、投资和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保险业的进一步开放。欧盟和美国分别是中国以出口额衡量的第一和第二大贸易伙伴, 二者间的自由贸易安排难免会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运行产生影响。作者通过使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基于动态比较分析的视角, 以美欧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作为冲击变量, 模拟了 TTIP 对中国宏观经济和各行业产出和贸易的影响。其模拟结果显示: 在其他条件不变时, 如果 TTIP 顺利建成实施, 其对中国宏观经济的综合负面影响较为明显, 会对中国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和服务业的产出和出口贸易造成负面冲击。

汤婧(2013)^②认为当前亚太区域经济整合呈现两大明显趋势, RCEP 谈判开启与 TPP 扩大谈判逐步推进, 二者所呈现的竞争态势也使得亚太区域未来的贸易格局变得不甚明朗。中国作为亚太区域生产链中重要一环, TPP 与 RCEP 将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因此, 其认为在目前区域经济整合的大背景下, 各国彼此消除关税与非关税壁垒, 相互给予贸易自由化的互惠待遇, 已是全球的主流趋势。中国要在国际经济贸易新秩序构建中积极争取公平贸易机会, 同时必须有开放市场的准备与承诺。开放市场措施不但可协助中国加入区域经济整合行列, 获得进入国际市场取得公平竞争的机会。如果能逐步的开放市场, 更可以减少国内产业因为突然开放而可能承受之冲击。

此外, 孙玉红(2013)^③对中日韩三边投资协定的新变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其认为中日韩三边投资协定新变化符合日本双边投资协定的发展趋势, 并且其会约束中国对日资进一步保护和开放。对中国而言, 中日韩投资协定的签署对于吸引日韩投资的作用不明显, 中国在中日韩投资协定中的承诺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利益。

(四) 双边投资协定: 中美 BIT 谈判的热议

姚枝仲(2013)^④认为中美 BIT 的实质性谈判是中美两国重设双边国际投资规则的过程。这是一场美国发起的规则重构活动, 中国在有限满足美国核心利益诉求的过程中, 能够利用 BIT 为中国长期发展服务, 但也需要特别小心由此带来的隐患, 尤其是 BIT 可能带来的国内政策国际化和资本账户过度过快自由化。

① 陈虹、韦鑫、余珮(2013): “TTIP 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前瞻性研究——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模拟分析”, 《国际贸易问题》, 第 12 期。

② 汤婧(2013): “TPP 与 RCEP: 中国在亚太区域经济整合新秩序下的挑战与策略”, 《全球化》, 第 6 期。

③ 孙玉红(2013): “中日韩三边投资协定的新变化及中日利益取向分析”, 《国际贸易》, 第 11 期。

④ 姚枝仲(2013): “如何应对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实质性谈判”, 《国际经济评论》, 第 6 期。

韩冰 (2013)^① 采用法学理论与规则分析方法, 对美国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公布的最新版本 BIT 范本的新变化予以了详细研究, 指出该范本反映了美国政府继续探索介于卡尔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这两种制度间的国际投资法的“第三条道路”的发展范式, 也反映了美国对外投资政策近来力推竞争中立政策与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向, 而这对于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将带来一定的影响与挑战, 因此中国政府需要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予以高度重视。

此外, 学界对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环境规则、负面清单等也进行了较为有深度的分析。赵玉意 (2013)^② 对在 BIT 和包含投资规则的 FTA 的环境规则进行了分析, 认为将环境规则纳入 BIT 和 FTA 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BIT 和 FTA 文本中环境条款的表现形式日益丰富, “非排除措施”条款、平衡条款、除外条款、冲突条款、程序条款等类型不断涌现。从发展态势上看, BIT 和 FTA 中的环境条款经历了从双边投资协定向自由贸易协定的演化, 在内容和架构上历经了从一元向多元、从分散到集中的演变, 在定位上则实现了从完全附属到去边缘化的突破。李庆灵 (2013)^③ 对国际投资协定中国民待遇义务的承担方式, 即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两种模式的进行了细致地分析, 其认为负面清单模式令缔约国所承担的条约义务过高, 给予外资以准入阶段的国民待遇, 将给中国带来极大的挑战, 毕竟, 准入门槛的撤除将会大幅挤压施政空间, 增加被诉风险。虽然中国可以依据习惯国际法主张免责, 但习惯国际法也仅是在事后承认相关不符措施的合法性。

英文参考文献

- Allie E. Bagnall, Edwin M. Truman. 2013. “Progress on Sovereign Wealth Fund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An Updated SWF Scoreboard.”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apers* No. PB13-19.
- Roberts Anthea. 2013. “Clash of Paradigms: Actors and Analogies Shaping the Investment Treaty System.”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07 (1) .
- Antràs P. , Chor D. 2013. “Organizing the Global Value Chain.” *Econometrica*, 81 (6) .
- Bernardo Bortolotti et al. 2013. “The Sovereign Wealth Fund Discount: Evidence from Public Equity Investments.” *Baffi Center Research Paper* No. 2013-140.
- Bianchi Javier, Juan Carlos Hatchondo, Leonardo Martinez. 2013. “International Reserves and Rollover Risk.” *IMF Working Paper* WP13/33.
- Cai Congyan. 2013. “Trans - Pacific Partnership and the Multilater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Journal of East Asia and International Law*, 6 (2) .
- Lavopa Federico M. , Barreiros Lucas E. , Bruno M. Victoria. 2013. “How to Kill A Bit and Not Die Trying: Legal and Political Challenges of Denouncing or Renegotiating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16 (4) .
- Huang Yiping, Bijun Wang. 2013. “Investing Overseas without Moving Factories Abroad: The Case of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Asian Development Review*, 30 (1) .
- Salacuse Jeswald W. 2013. *The Three Law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les Kate. 2013. *The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① 韩冰 (2013): “美国对外投资政策法律新进展—基于 2012 年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范本的分析”, 《国际经济评论》, 第 5 期。

② 赵玉意 (2013): “BIT 和 FTA 框架下环境规则的经验研究—基于文本的分析”, 《国际经贸探索》, 第 9 期。

③ 李庆灵 (2013): “当议 IIA 中的外资国民待遇义务承担方式之选择”, 《国际经贸探索》, 第 3 期。

11. Liao F. H. , Wei Y. H. D. 2013. "TNCs' Technology Linkages with Domestic Firms: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ICT Industry in Suzhou, China."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53 (6) .
12. Mark Thatcher. 2013. "National Policies towards Sovereign Wealth Funds in Europe: A Comparison of France, Germany and Italy." LSE, *Policy Brief* No. 2.
13. Nunn N. , Trefler D. 2013. "Incomplete Contracts and the Boundaries of the Multinational Firm."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94.
14. Sheng Liugang. 2013. "Did China Diversify its Foreign Reserves?"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28.
15. Shrestha Prakash Kumar. 2013. "Banking Systems, Central Banks and International Reserve Accumulation in East Asian Economies." *Economics*, 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 No. 2013 - 14.
16. Si Yuefang, Ingo Liefner, Tao Wang. 2013.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Middle Path between Ownership Location Internalization Model and Linkage - Leverage - Learning Model." *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 23 (5) .
17. VadiValentina, Gruszczynski Lukasz. 2013. "Standards of Review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Arbitration: Multilevel Governance and the Commonwea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16 (3) .
18. Wang Yongzhong, Duncan Freeman. 2013.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nd China's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Management." *Asia Paper*, 7 (2) .
19. Yang Yong, Pedro S. Martins, Nigel Driffield. 2013. "Multinational Performance and the Geography of FDI." *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 23 (5) .

中文参考文献

1. 鲍洋 (2013): "金砖国家引进 FDI 的经济增长效应比较研究", 《国际商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第 2 期。
2. 陈万灵、杨永聪 (2013): "区域金融发展与 FDI 流入规模的实证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国际经贸探索》, 第 4 期。
3. 陈虹、韦鑫、余珮 (2013): "TTIP 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前瞻性研究—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模拟分析", 《国际贸易问题》, 第 12 期。
4. 戴万稳、陈晓燕 (2013): "基于竞争优势架构的中韩跨国公司海外扩张动机比较研究", 《亚太经济》, 第 4 期。
5. 戴翔 (2013): "中国企业 '走出去' 的生产率悖论及其解释—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南开经济研究》, 第 2 期。
6. 葛顺奇、罗伟 (2013): "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母公司竞争优势", 《管理世界》, 第 6 期。
7. 谷宇 (2013): "金融稳定视角下中国外汇储备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兼论外汇储备短期调整的非对称性", 《经济科学》, 第 1 期。
8. 韩冰 (2013): "美国对外投资政策法律新进展—基于 2012 年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范本的分析", 《国际经济评论》, 第 5 期。
9. 黄敏 (2013): "跨国公司避税与我国税务机关反避税—转移定价策略性博弈分析", 《时代金融》, 第 14 期。
10. 华广敏 (2013): "高技术服务业 FDI 对中美制造业效率影响的比较分析—基于中介效应分析", 《世界经济研究》, 第 3 期。
11. 揭水晶、吉生保、温晓慧 (2013): "OFDI 逆向技术溢出与我国技术进步—研究动态及展望", 《国际贸易问题》, 第 8 期。
12. 蒋艳艳 (2013): "从 '毒苹果事件' 审视苹果公司的供应链社会责任", 《河南社会科学》, 第 10 期。
13. 姜英梅 (2013): "海湾国家石油美元投资模式", 《阿拉伯世界研究》, 第 1 期。

14. 景红桥、王伟 (2013): “金融体制、法律起源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国际贸易问题》, 第 12 期。
15. 蒋冠宏、蒋殿春、蒋昕桐 (2013): “我国技术研发型外向 FDI 的‘生产率效应’—来自工业企业的证据”, 《管理世界》, 第 9 期。
16. 李嘉 (2013): “跨国公司企业文化建设经验与启示”, 《中外企业文化》, 第 22 期。
17. 李庆灵 (2013): “刍议 IIA 中的外资国民待遇义务承担方式之选择”, 《国际经贸探索》, 第 3 期。
18. 李怀建、沈坤荣 (2013): “FDI、内生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基于 OECD 国家的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 《世界经济研究》, 第 2 期。
19. 李坤望、王有鑫 (2013): “FDI 促进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吗? —基于动态面板系统 GMM 方法的研究”, 《世界经济研究》, 第 5 期。
20. 李国学 (2013): “制度约束与对外直接投资模式”, 《国际经济评论》, 第 1 期。
21. 李子豪、刘辉煌 (2013): “外商直接投资、地区腐败与环境污染—基于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 《国际贸易问题》, 第 7 期。
22. 李晓钟、刘振宇 (2013): “FDI 对我国制造业碳排放影响分析”, 《国际商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第 1 期。
23. 廖利兵、曹标 (2013): “企业出口与水平型 FDI 内生选择机制分析”, 《世界经济研究》, 第 3 期。
24. 林季红、郭志芳 (2013): “金融市场、FDI 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世界经济研究》, 第 5 期。
25. 刘宏、李述晟 (2013): “FDI 对我国经济增长、就业影响研究—基于 VAR 模型”, 《国际贸易问题》, 第 4 期。
26. 刘青、张超、吕若思 (2013): “跨国公司在华溢出效应研究: 人力资本的视角”,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第 9 期。
27. 刘建勋、刘黎 (2013): “基于网络关联与组织演化双重视角的中国跨国公司成长策略研究—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借鉴与启示”, 《财贸研究》, 第 1 期。
28. 罗良文、李珊珊 (2013): “FDI、国际贸易的技术效应与我国省际碳排放绩效”, 《国际贸易问题》, 第 8 期。
29. 罗伟、葛顺奇 (201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为分布及其决定因素—基于水平型投资的研究”, 《经济学季刊》, 第 4 期。
30. 罗素梅、陈伟忠、周光友 (2013): “货币性外汇储备资产的多层次优化配置”,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第 6 期。
31. 祁春凌、黄晓玲、樊瑛 (2013): “技术寻求、对华技术出口限制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 《国际贸易问题》, 第 4 期。
32. 沈军、包小玲 (2013):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基于金融发展与国家风险因素的实证研究”, 《国际金融研究》, 第 9 期。
33. 孙玉红 (2013): “中日韩三边投资协定的新变化及中日利益取向分析”, 《国际贸易》, 第 11 期。
34. 汤婧 (2013): “TPP 与 RCEP: 中国在亚太区域经济整合新秩序下的挑战与策略”, 《全球化》, 第 6 期。
35. 田巍、余森杰 (2012): “企业生产率和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企业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 《经济学(季刊)》, 第 2 期。
36. 王碧珺 (2013): “被误读的官方数据——揭示真实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 《国际经济评论》, 第 1 期。
37. 王乐、张翼 (2013): “主权财富基金透明度研究”, 《上海金融》, 第 10 期。
38. 王子先 (2013): “华为: 开放式创新打造世界一流高科技型跨国公司”, 《全球化》, 第 3 期。
39. 王翠、甘小军、刘超 (2013): “国际双边发展援助对 FDI 的影响研究——基于 17 个 OECD 国家对华发展援助的实证”, 《国际贸易问题》, 第 6 期。
40. 王若冰 (2013): “对跨国公司海外产业转移决策的研究”, 《中国证券期货》, 第 8 期。

41. 王文治、扈涛 (2013): “FDI 导致中国制造业价格贸易条件恶化了吗? ——基于微观贸易数据的 GMM 方法研究”, 《世界经济研究》, 第 1 期。
42. 王伟、孙大超、杨娇辉 (2013): “金融发展是否能够促进海外直接投资——基于面板分位数的经验分析”, 《国际贸易问题》, 第 9 期。
43. 王勋 (2013): “金融抑制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 《国际经济评论》, 第 1 期。
44. 王永中 (2013): 《中国外汇冲销的实践与绩效》。上海: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45. 王宇哲、张明 (2013): “美国长期国债市场上主要外国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比较”, 《国际金融研究》, 第 11 期。
46. 邢夫敏 (2013): “FDI 主导型产业集群特征与本土企业产业升级对策”, 《科技进步与对策》, 第 2 期。
47. 徐清 (2013): “我国双重二元经济结构下 FDI 的异质性”, 《世界经济研究》, 第 1 期。
48. 徐忠、徐荟竹、庞博 (2013): “金融如何服务企业走出去”, 《国际经济评论》, 第 1 期。
49. 阎大颖 (2013):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决定因素”, 《国际贸易问题》, 第 7 期。
50. 姚枝仲 (2013): “如何应对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实质性谈判”, 《国际经济评论》, 第 6 期。
51. 余官胜、王玮怡 (2013): “海外投资, 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内就业技能结构”, 《国际贸易问题》, 第 6 期。
52. 张斌 (2013): “外汇储备的资产属性、改革方案与还汇于民”, 《国际经济评论》, 第 6 期。
53. 张明、谭小芬 (2013): “中国短期资本流动的主要驱动因素: 2000—2012”, 《世界经济》, 第 11 期。
54. 张宇、蒋殿春 (2013): “FDI、环境监管与工业大气污染——基于产业结构与技术进步分解指标的实证检验”, 《国际贸易问题》, 第 7 期。
55. 张庆昌、蒋殿春、张宇 (2013): “美国跨国公司服务中国市场——为什么偏爱出口贸易?”, 《经济学》, 第 1 期。
56. 张永庆、李浩、赵清斌 (2013): “‘走出去’战略下我国民企海外总部构建模式研究”, 《管理科学》, 第 3 期。
57. 张海亮、薛琰如、王亦奇 (2013): “信息披露、投资策略与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收益”, 《中国经济问题》, 第 3 期。
58. 张海亮、周卫江、王亦奇 (2013): “全球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空间分布、路径选择”, 《经济问题》, 第 5 期。
59. 张海亮、郭明 (2013): “可信承诺、合作联盟与主权财富基金对外投资”, 《经济研究参考》, 第 62 期。
60. 张海亮、钱惠、王亦奇 (2013): “基于经济周期的我国主权财富基金行业选择”, 《上海金融》, 第 2 期。
61. 张东 (2013): “主权财富基金对投资对象公司价值的影响”, 《金融理论与实践》, 第 1 期。
62. 赵玉意 (2013): “BIT 和 FTA 框架下环境规则的经验研究——基于文本的分析”, 第 9 期。
63. 邹建华、韩永辉 (2013): “引资转型、FDI 质量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珠三角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国际贸易问题》, 第 7 期。